

英语世界亚当·斯密研究七十年*

杨 芳

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由于资料的局限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英语世界的亚当·斯密研究主要囿于相对单一的领域。随着相关文献的陆续发现和出版，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相对单向度的阐释开始朝系统性解读转向。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滞胀时期的到来，尤其是 1976 年至 1983 年“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陆续出版，推动斯密研究走向繁荣。多元化和全面性探究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出现井喷式发展。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斯密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经济学——再次受到关注，学者们从多维的角度对斯密的这一学说进行了再阐释。本文试图梳理近 70 年来的英语世界斯密研究学术史，以管窥国外斯密研究的动态、探寻观念史研究范式下该领域的未来拓展空间。

关键词：英语世界 亚当·斯密研究 观念史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去世至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资料的局限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英语世界的斯密研究主要囿于经济学或伦理学领域。随着相关文献的陆续发现和出版，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相对单向度的阐释开始有所突破，出现了朝系统性解读转向的趋势。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滞胀时期的到来，尤其是“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出版，推动斯密研究走向繁荣。多元化和全面性探究在之后的 20 余年里出现“井喷式”发展，成果异常丰富。进入 21 世纪，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斯密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经济学——再次受到关注，学者们从多维的角度、

[作者简介] 杨芳，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邮政编码：712000，电子信箱：156560976@qq.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苏格兰经济转型研究”（批准号：19BSS02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批准号：21&ZD247）阶段性成果。感谢外审专家的匿名审稿意见。

用新的方法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再阐释。鉴于目前英语学界和国内学界对斯密研究动态的长时段综合考察较为缺乏，2023年又恰逢斯密诞辰三百周年，本文拟对近70年以来的英语世界斯密研究做一粗略的梳理和回顾，^①并从观念史研究范式角度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思考。^②

一、打破藩篱：从相对单一的阐释开始朝系统性解读转向

斯密去世以后，其生平事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直阙如，有关其思想的研究仅仅依据他公开出版的两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尤其是《国富论》，因此，斯密在普通读者心中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③这根源于18世纪苏格兰人的一个传统：在自己临终前销毁关涉隐私的私人信件和不愿发表的文稿，同时竭力替亲朋好友保守秘密，以维护彼此的形象。斯密就是该传统的忠实遵从者和坚定捍卫者。其一，他疏于写信，留下来的少量信件，篇幅一般较短，内容很少透露其思想；其二，他不喜欢学生在他讲课时做笔记，因为担心学生在笔录时误记或歪曲他的思想；其三，斯密只愿出版构思缜密的巨著，很少写随笔性的小册子和应景性的文章；其四，斯密在临终前委托两位好友当面销毁他未

① 英语学界曾就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斯密研究进行了考察。利奥尼达斯·蒙特斯（Leonidas Montes）和埃里克·施利塞尔（Eric Schliesser）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的近30年斯密研究的复兴，但是缺少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斯密研究成果的具体分析（Montes and Schliesser, 2006: 1—5）。迈克·希尔（Mike Hill）和沃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以问题为中心，从经济学的角度引入两个针锋相对的“斯密形象”，但是缺乏有关斯密研究整体态势的梳理（Hill and Montag, 2015: 1—22）。国内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国外的斯密研究。朱绍文先生详细介绍了20世纪日本学界的斯密研究状况（朱绍文，1990）。罗卫东先生系统梳理了国外“斯密复兴运动”的原因、阶段及其特征，并对国外学界有关斯密伦理思想的争论展开了深入分析（罗卫东，2006: 13—36）。康子兴先生对国外学界的斯密政治思想研究进行了专题性归纳和阐释（康子兴，2017: 13—26）。不过，综合考察近七十年来英语世界斯密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尚付阙如。

② 斯密作为一代思想巨擘，影响非常深远，长期以来备受各国学者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且层出不穷。本文仅对英语世界的斯密研究进行粗浅梳理，在内容的选取上，无法穷尽所有，难免挂一漏万。

③ 斯密在世时，《道德情操论》出版了六版，《国富论》出版了五版，两本著作首版时间分别为1759年和1776年。

完成的手稿；其五，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去世后，斯密作为休谟的遗稿管理人，成功阻止出版商公开出版休谟的书信。这样，斯密这位过分关注身后名誉的思想家，有意给后世留下一个模糊而神秘的形象。当时的苏格兰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一般不替在世或故去不久的人作传，否则就是不恭之举。斯密去世后的第三年，其生前好友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尽管拥有斯密的许多私人文件，但作为恪守该传统的一员，仅仅出于责任心，写了一篇非常简短的回忆录《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并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上宣读（Stewart, 1980: 265—332）。此后百余年里，这个薄薄的小册子一直是人们了解斯密生平的主要依据。

一个多世纪以后（1895年），约翰·雷（John Rae）在参考斯图尔特的回忆录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斯密的新资料，其中包括斯密与他人往来的一些信件，完成了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传记——《亚当·斯密传》。时至今日，此书成为学者们研究斯密的必备参考书，不过它很少论及斯密的思想 and 学说（雷，1983：1—397）。40余年后，斯科特（W. R. Scott）写了《作为学生和教授的亚当·斯密》，补充了许多雷所著的传记中没有的新材料，进一步丰富了对斯密的了解（Scott, 1937）。20世纪60年代，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针对雷的《亚当·斯密传》写了一篇较长的阅读指南，补充、纠正和质疑了雷（1983：398—511）的某些描述和结论。时至今日，斯图尔特、雷、斯科特和瓦伊纳依然是我们了解斯密一生的主要贡献者。

长期以来，由于有关斯密生平的资料不足、斯密手稿被焚和讲义散佚，以及《国富论》在西方世界极度畅销，使得斯密的其他著作以及蕴含其中的整个思想体系被忽略或遗忘。由此，西方学界对斯密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局限于经济学领域，斯密于是被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首创者。除了极少数斯密研究者之外，作为伦理学家或道德哲学家的斯密几乎鲜为人知。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在缺少上述文献的前提下，从民族主义出发，为抵制英美强势国家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口号，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视为毫无关联甚至相互矛盾的著作，认为《国富论》宣扬的是唯利是图的“经济人”，而《道德情操论》力倡的是乐善好施的“道德人”，并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或“亚当·斯密矛盾”。因此，他们认为，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不是哲学家”（Otteson, 2000），历史上“有两个亚当·斯密，而不是一个亚当·斯密”（斯

皮格尔, 1999: 365)。此后, 这一观点长期支配斯密研究者的研究路向长达百余年之久。1878年, 斯卡尔津斯基 (W. Skarzynski) 甚至认为自己推断出了斯密改变想法、实现所谓“理论转变”的时间点, 即在他游历欧洲大陆、了解法国哲学家之后 (Montes and Schliesser, 2006: 2)。19世纪末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斯密的藏书目录、传记、讲义陆续被发现或出版——其中最关键的是1895年和1896年斯密的《法学讲义》(学生笔记)被埃德温·坎南 (Edwin Cannan) 发现和校订出版, 学界对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认识逐步深入和全面, 该问题才最终被公认为“伪问题”而退出争论舞台。^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早期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仑 (Thorstein Veblen) 不仅深受达尔文主义进化方法的影响, 还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获得诸多启发。他指出, 使人类经济生活得以实现的是制度, 制度由思想和习惯形成, 思想和习惯产生于人类本能。因此, 他认为, 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 要研究人类的经济生活及制度, 就必须研究人的本能。他所言的这—本能类似于斯密笔下的“激情” (Veblen, 1914: 235)。可以说, 斯密的人性科学成为凡勃仑阐释自己的制度主义观念的来源之一。此外, 在《有闲阶级论》中, 凡勃仑采用类似于斯密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模式, 以分析不同社会阶段的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和制度, 从而为自己创立制度经济学和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 (凡勃仑, 2002: 5—19)。不过, 凡勃仑并没有发表以研究斯密思想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 分别对斯密的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并卓有成效的两个代表人物, 是芝加哥学派的瓦伊纳和美国哲学家格伦·莫罗

① 斯密的《哲学论文集》于1795年由他的挚友约瑟夫·布莱克 (Joseph Black) 和詹姆斯·赫顿 (James Hutton) 编辑出版。斯密的《法学讲义》(学生记录的笔记)于1896年由坎南校订出版。1937年, 斯科特在《作为学生和教授的亚当·斯密》中, 收录了斯密在爱丁堡的讲稿中的两个片段。这两个片段分别涉及分工问题和水陆交通问题。斯密的《修辞学与文学讲义》在1959年的一个藏书拍卖会上被约翰·洛西恩 (John M. Lothian) 发现, 后由其校订出版。伊恩·罗斯 (Ian S. Ross) 和欧内斯特·莫斯纳 (Ernest C. Mossner) 从1965年开始对斯密的书信进行广泛搜集和整理,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 于1977年出版了《亚当·斯密通信集》。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 苏联学者卢森贝 (1959: 365) 还坚持认为, 在《道德情操论》中, 同情心是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 在《国富论》中, 利己主义是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 人为地把这两本书割裂开来。

(Glenn R. Morrow)。瓦伊纳发表了多篇以斯密为题的学术成果。通过研究，他将斯密直接定义为一个制度主义者，由此明确地将制度经济学的一大思想源头追溯到斯密（罗卫东，2006：16）。与当时大多数主流学者依然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开解读的取向不同，莫罗开始将这两部著作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之上综合研究斯密的伦理思想（Morrow，1932）。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约瑟夫·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不仅把斯密作为一个观点一致而非矛盾的思想家予以考察，还试图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关系的角度探究他的意图，并在某种意义上给他加上了一顶政治思想家的桂冠。根据他的研究，斯密属于近代政治哲学传统中的重要一员；这一传统试图以一种关照整个宇宙或自然整体的崭新视界，重建人类对自我处境的了解，并在重构“自然”的基础上探寻实现人类自由、幸福和财富的路径。他还敏锐地发现，斯密的巨大成就在于他用物质财富生产与分配来解释近代政治哲学的意义，此外，斯密在关注物质财富生产的同时没有忽略人类所处的道德窘境，并希望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Cropsey，1957：1）。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麦克菲（A. L. Macfie）提出“《国富论》仅仅是……《道德情操论》中哲学暗示的一个特例”，以此公开否认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亚当·斯密问题”（Macfie，1967：75）。这一阶段，英语学界还关注到了斯密思想的经院哲学之源以及蕴含的法学元素。例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国富论》并非来自重农学派和18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而是来自经院哲学家、自然法学家，以及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家（熊彼特，1996：278—279）。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甚至将斯密与休谟并称为法哲学家，认为他们都在自由主义立宪思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哈耶克，2000：555—557）。

至此，从相对单一的角度阐释斯密思想的藩篱开始被突破。不过总的来说，在英语学界，斯密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是经济学家的专属领域，斯密因此被视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值得指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40余年里，由于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及经济大萧条的持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面世、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的推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重建，斯密作为思想家的地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有关他的研究也因此遭到极大的忽视。20世纪40年代，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①和熊彼特一致认为，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及相应的文明，不仅已经消失，而且永远不再重生（波兰尼，2007：23；Schumpeter, 1950：61）。面对这一反市场的潮流，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②和哈耶克开始重回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掘和坚持以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米塞斯直接将使“自由主义”形成为“一种体系”的伟大功绩追溯到斯密和休谟，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奠定现代商业社会这一非凡思想体系之基石的源头与苏格兰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米瑟斯，1995：210）。哈耶克也明确把休谟和斯密开启的这一传统视为引导他走向知识殿堂的明灯，并沿着他们开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二人均继承并发展了斯密、休谟在探讨商业社会时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六大要素：个人主义、自由、自然法、自发秩序、法治和有限政府（哈耶克，1989；米瑟斯，1995）。遗憾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立场和观点可谓应者寥寥。与此同时，熊彼特曾武断地评价斯密的《国富论》并“不含有真正的思想”，充其量做了一些“协调整理工作”，故称不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熊彼特，1996：280—281）。作为“创新理论”的鼻祖和商业史研究的创始人，熊彼特的上述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客观和全面地理解斯密思想的丰富性、独创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

二、走向繁荣：多元化和全面性研究的井喷式发展

1973年至1975年，欧美世界发生了一场从英国迅速扩展至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40余年间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它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持续高速增长的历史，并使其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滞胀”时期。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重要原

① 亦有译为卡尔·波兰尼。

② 亦有译为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因，就是多年来西方国家长期过度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国的公共政策部门通过切实回归休谟、斯密所开启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滞胀和经济衰退问题。例如，1988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指出，早在她之前，苏格兰人就发明了“撒切尔主义”，从而将自己自1979年以来的施政理念追溯到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留下的思想遗产（诺曼，2021：2—3）。此外，哈耶克作为始终捍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帮助英美摆脱滞胀、重振经济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并于1984年和1991年相继获得英国荣誉勋章和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在这一特定背景之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亚当·斯密全集》的陆续出版，斯密研究得到了根本性的推进。1976年至1983年，格拉斯格大学为了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陆续主持出版了六卷本的“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即《亚当·斯密全集》）。^①这就为全面研究斯密庞大的思想体系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权威文本和基础性文献。此外，1976年一系列旨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国际性会议，成为斯密研究热潮被掀起的一个明显信号。美国相继出现了两本纪念性论文集（Glahe，1978；O'Driscoll，1979），主编分别为弗雷德·格拉赫（Fred R. Glahe）和杰

① 这六卷本分别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976）、《国富论》（1976）、《哲学论文集》（1980）、《修辞学与文学讲义》（1983）、《法学讲义》（1978），以及《通信集》（1977）。具体参见：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I):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W. P. D. Wightman, J. C. Bryce, and I. S. Ross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II):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 C. Bryce (ed.),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V):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V):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E. C. Mossner, and I. S. Ross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VI):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拉尔德·奥德里斯科尔 (Gerald P. O'Driscoll)。1981年至1987年,美国的自由基金出版社发行了“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全集”的影印版。^①此后,斯密的思想开始受到大西洋彼岸学界的广泛关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学界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进一步提升了斯密研究在20世纪的热度。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把斯密视为经济学家,或者作为伦理学家的较为单一的研究格局一去不返,斯密的形而上学思想、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学思想、国际政治学说,乃至修辞学与文学思想,引起了不同领域专家的强烈兴趣。由此,把斯密作为一个广义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纷至沓来,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在英语世界,斯密研究的主要阵地是斯密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的权威之一是该校的斯密讲座教授安德鲁·斯金纳 (Andrew S. Skinner),他不仅是《亚当·斯密全集》的主编,还与托马斯·威尔逊 (Thomas Wilson) 汇编了一册《亚当·斯密研究论文集》。在序言中,斯金纳指出,斯密在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时,把他的讲义分为4个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斯金纳提醒大家,斯密不仅学术兴趣极其广泛,而且这些兴趣及其思想之间并非彼此孤立、相互隔绝,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研究斯密的学说,首先应该从斯密的人性科学入手,它是理解斯密思想体系的必要前提 (Skinner, 1975: 2—3)。在这本论文集中,非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与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几乎各占一半,且被置于该论文集的第一部分,尤见编者的良苦用心。1979年,斯金纳

① 影印本参见: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I):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W. P. D. Wightman, J. C. Bryce, and I. S. Ross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II):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J. C. Bryce (ed.),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V):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5;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V):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E. C. Mossner, and I. S. Ross (eds.),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VI):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把自己从1970年至1976年间研究斯密的成果结集出版，题为“社会科学体系”。他认为，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以牛顿的方法论为基础，将宇宙和人类社会比拟为一架大机器。他还将斯密的伦理学、法学、经济学、修辞学等学问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认为这种体系是一架“想象中的机器”，意即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Skinner, 1979: 9—11）。该书是这一时期从整体的、综合的视角研究斯密思想的代表作。

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英语学界对斯密的研究除了继续在传统领域——斯密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之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外，还呈现出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出现了研究斯密政治学和法学的专著，以及从古典共和主义角度考察斯密及其他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一些论文。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克努兹·哈康森（Knud Haakonssen）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在这之前，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做了先驱性的努力：在研究休谟时，他对斯密和休谟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大胆提出，斯密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对政治毫不关心的政治冷漠者。和克罗普西一样，福布斯充分肯定了斯密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他还大胆提出，过去大而化之地给休谟和斯密分别贴上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标签，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斯密像休谟一样，是一个“怀疑的”或者说科学的辉格党，一位政治学方面的“哲学家”。这就为研究斯密政治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Forbes, 1975: 125—192）。温奇在福布斯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斯密的政治思想。在《亚当·斯密的政治学》一书中，温奇明确指出，他不会直接涉及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而是打算用自由资本主义的视角去试图恢复斯密思想的政治维度。他认为，由于学界过分强调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传统的关键人物以及过分强调《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差异，这一维度长期被遮蔽和歪曲。他希望立足于18世纪这个历史背景来探讨斯密的政治学，并和福布斯一样，极力反对给斯密贴标签（Winch, 1978: 1—2）。在此基础上，哈康森在斯密研究方面又做了进一步推进。他认为，克罗普西、温奇和福布斯，以及一些法国学者在研究斯密的政治思想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斯密的自然法，但是他们没有广泛地加以论述，因此他想要在《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中实现他们所没有完成的目标（Haakonssen, 1981: 1—3）。随着研究的深入，1996年，哈康森又出

版了一部著作《自然法与道德哲学：从格劳秀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他认为，18世纪道德哲学的重要部分极大地受到在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之后的新教教义内发展起来的自然法理论影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尤其如此。在广泛俯瞰17世纪欧洲自然法背景之后，哈康森把主题集中在18世纪苏格兰道德思想上（Haakonssen, 1996: 1—5）。此外，研究斯密政治思想的文章和专著在这一时期也大量涌现（Fitzgibbons, 1995）。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和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斯密的《国富论》指向的是现代“商业社会”，其核心关注点是正义问题；“相对于市民德性，斯密选择了严格正义；相对于积极自由，斯密选择了消极自由”（Hont and Ignatieff, 1983: 1—52）。该书不仅力图在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还试图理解18世纪以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巨匠为什么认为在追求商业利润的过程中更大程度的自由会为人类的稳定、繁荣与和平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石。可以说，该书是这一时期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研究斯密政治思想这一路向中，英语世界出现了一条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古典共和主义（又称公民人文主义）的视角。该路径的形成，主要源自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波科克（John G. A. Pocock）。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时刻：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传统》^①中指出，古典共和主义作为一种传统，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经过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然后传到英国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再经过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后被美国建国之父所继承。因此，他提醒学者们从古典共和主义的视角去研究18世纪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休谟、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斯密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Pocock, 1983: 462—530）。此外，他在《德行、商业和历史：十八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中，以古典共和主义为视角，采用语境主义研究

① 该书初版于1975年。

范式，考察了18世纪包括斯密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关于德行、权利与商业之关系的思想争论（Pocock, 1985: 1—38）。在波科克的影响下，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研究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休谟、斯密等苏格兰思想家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一个核心术语是“腐败（corruption）”，因此，学者们以这一视角研究斯密等启蒙思想家对商业社会的“腐败”的批判时，廓清了斯密在内的18世纪思想家所言的“腐败”概念与19世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以及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不同所指。这样，此前从异化的角度探讨斯密思想的研究路向，作为一种“时代错置”，受到批评并得到纠正。

把斯密置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是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研究取向和特征。简·伦德尔（Jane Rendall）、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J. Berry）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起源》一书中，伦德尔首先申明，“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不是孤立的人物，偶然出现的天才火花；有许多人……在他们周围”，他们面临同样的社会环境，参与同样的社交活动，共同致力于苏格兰的启蒙。因此，伦德尔主张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大背景下去研究苏格兰的思想家这一知识群体（Rendall, 1978: 1）。贝里则通过俯瞰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来勾勒这个时期苏格兰的社会理论。他指出，尽管他希望专家们能够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主要针对的是普通读者（Berry, 1997: 1—3）。他使用“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术语，是为了讨论从1740年到1790年之间（也就是休谟的《人性论》第三卷出版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出版的时间之间）出现的学术著作。他之所以用“社会理论”作为标题，是为了把狭义上的哲学问题、科学主题排除在外，而把历史理论、政治和经济著作、道德哲学以及与苏格兰人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包括在这个标题下。这是从广义的社会科学角度详细探讨以休谟和斯密为主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此外，在这一时期，沿着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路径研究斯密在内的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的论文和专著前后还有许多，不过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这一时期的第三大特征是，斯密研究日益细化，开始了对斯密学说的个别概念的挖掘、梳理，由此也相应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比较性研究。霍普（V. M. Hope）和塞缪尔·弗雷斯切克（Samuel Fleischacker）是这方面的代表。霍普在《一致同意的美德：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指出，斯密与哈

奇森和休谟都强调：道德，特别是美德，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基于人们在观察如何对待彼此时所享受到或遭受到的快乐和不快乐的相似性。但就审视道德上的愉快与不快以及道德舆论的性质这样的问题，虽然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不一致，但是三者又存在思想继承的关系（Hope, 1989: 1—11）。弗雷斯切克在《第三种自由的概念：康德和亚当·斯密学说中的判断力和自由》中，将斯密同亚里士多德和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自由”的理解进行对照，认为康德视自由产生于个人拥有独立判断力之时。以此为视角，他考察了斯密的自由概念，认为斯密笔下的“自由”是以人的独立主体的形成为主旨的第三类自由概念，即含有康德所指的有判断力的自由（Fleischacker, 1999: 120—138）。此外，有关斯密提出的个别概念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篇文章。例如，对于“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有些文章从自然神论角度加以考察（Davis, 1989），有些文章则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角度来加以阐述（Nozick, 1994）。

就比较性研究来说，学术成果中不仅出现了把斯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休谟、弗格森、卢梭、米勒、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人进行的横向比较，还出现了把他与他之前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哈奇森，以及与他之后的马克思等思想家进行的纵向比较。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映衬出斯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揭示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承脉络。^①

这一时期的第四个特征是，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和新出现的研究成果，以传记的形式，全面叙述斯密的生平，追踪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这一重大贡献要归功于罗斯，20世纪90年代，他出版了一部卷帙浩繁、内容详尽、史料充实的《亚当·斯密传》（Ross, 1995）。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斯密生平和思想的最为详细的传记，书中收录了许多以前的传记所缺乏的一手资料，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斯密的思想提供了许多新的重要线索。与此同时，罗斯通过有力的证据和缜密的分析，力图对斯密的一生及其个性做出准确的描述，并对斯密思想的发展路径和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的表述进行更为细致的追踪性记叙，由此打破了斯密长期以来被固化的形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乐观鼓吹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斯密思想的误读，也激发了人们思考斯密作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为现代世界的缔造者之一为人类社会留下的丰富而多元的思想遗产。

此外，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演化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也为斯密研究留下了一席之地。自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 Winter）出版《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国际学界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被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学派的发展所拓宽。该学说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试图为整个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以努力解释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他们的理论与自斯密时代以来至二战时期为止存在过的微观经济理论所表述的传统“十分一致”，《国富论》第一篇的标题就开始讨论“今天叫做技术进步的源泉和结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跟随斯密的脚步，“将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做了丰富的历史阐释，来确定较狭窄的经济分析之范围”。基于此，他们明确将斯密归入演化理论的“同盟者和先行者”之列，认可了斯密对演化经济学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纳尔逊和温特，1997：40—52）。就斯密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杰弗里·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的探讨比二十余年前的纳尔逊和温特更为具体和全面。他在1999年出版的《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中，将划分“演化经济学”的种种理论进路的标准归为三点：本体论标准——新事象（novelty，新奇性）、方法论标准——还原论（reductionism）、“隐喻标准”——生物学隐喻。根据这些标准，霍奇逊肯定了“斯密和马尔萨斯著作中的竞争和冲突的思想同时启发了经济学和生物学”，并认为，科学离不开隐喻，隐喻提供了说明未知世界的认知论手段，而斯密在《天文史》中就大胆地使用了隐喻。不过，霍奇逊认为，斯密使用的是力学隐喻而非生物学隐喻。总之，霍奇逊确实将斯密纳入了为演化经济学提供理论进路的贡献者之列，承认了斯密思想中含有“演化”的成分（即他注意到了经济过程中的发明和创新）；但是，霍奇逊也认为，由于“斯密着重于决定主义或非线性发展”，因此很难将他归类（霍奇逊，2007：87—133）。

综上所述，斯密及其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一直是英语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朝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呈现出多元与全面的发展态势，成果异常丰富。在这种欣欣向荣的研究潮流中，斯密在英语学界中的形象也渐渐清晰、明朗和丰满。

三、回归传统：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再兴和重释

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再次面临诸多困境和巨大挑战，例如如何推动和维持经济的增长，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弊端和不断升级的不平等问题，如何在历史、利益和信仰均不相同的共同体之间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和理解决。尤其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问题变得更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美英等国的房地产泡沫扩大并破裂、华尔街投资银行倒闭、东西方股市跳水、信贷被冻结、制造业中心的工人大规模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在全球蔓延。

在这一时代困局之下，斯密要么被斥为造成上述灾难的罪魁祸首，要么被奉为解决上述难题的救世主。换言之，进入 21 世纪，有关市场管理或政府管理的争执，在世界各国依然难以调和。于是，斯密再次成为英语世界的学术热点，关于他的研究还在继续，至今未艾；相关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立体，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蔚为壮观。^① 就其政治经济学而言，学界的探索可以说是对斯密研究传统领域的回归，但是这一回归是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或新的结论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成果的简单重复。这一回归与创新大致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

不再孤立地依凭《国富论》来分析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将他的这一学说置于他所有著作和庞大思想体系中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解读，或将之放在苏格兰民族的知识传统和苏格兰大学教育体制中来理解，是这一时期斯密研究的第一大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例如，在论文集《苏格兰经济思想史》中，主编亚历山大·道（Alexander Dow）和希拉·道（Sheila Dow）在序言中指出，苏格兰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传统，该传统起源于 16、17 世纪，全盛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并一直延续至今（Dow and Dow, 2006: 2—4）。斯密属于此传统在 18 世纪的五大关键人物之一，其他四位依次为约翰·劳（John Law）、哈奇森、休谟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在该论文集中，蒙特斯和弗拉维奥·科米姆（Flavio Comim）的论文题目分别为“亚当·斯密：真正的

① 21 世纪初，斯密的头像被印在英国 20 英镑纸币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股“斯密热”在英语世界被再度掀起，斯密思想的重要性再度被人们关注。

牛顿主义者”和“亚当·斯密：试验时代的常识和美学”。蒙特斯通过探讨斯密从牛顿哲学中吸纳的方法，试图撕掉学术界给斯密贴的标签——“普遍经济均衡理论者”（Montes, 2006a: 102—119）。科米姆揭示了苏格兰常识哲学的主要特征和它在“试验时代”与牛顿实验方法的联系，由此考查斯密的常识概念以及他所坚持的试验的美学观——以简单、统一为标准的美学观，并在此基础上联系斯密的同感理论、分工论与交换思想（Comim, 2006: 123—145）。此外，艾伦·赫顿（Alan Hutton）考察了斯密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苏格兰经济学会及其期刊《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特别重提了“受斯密启发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传统”，这一传统就是苏格兰拒绝使用抽象演绎和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重视特定形式的应用型经济工作，从而促进了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赫顿还进一步追踪了该传统的教育制度之源：在1945年以前的苏格兰各大学，经济学并未采取专业化的教学模式，只是与经济史、统计学、政治学和商法一同讲授，由此促成了苏格兰人对应用经济学的重视（Hutton, 2006: 240—241）。

再如，埃玛·罗思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斯密发现经济生活与政治、情感以及想象的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即法学、哲学以及道德反思的思想也密不可分。基于这一判断，他们首先谈论的是斯密的“人性原则”——交换倾向和说服倾向，由此引入之后的几个话题：“商人和制造商”“制度与富裕的进步”“政治经济学体系”“君主或国家”“理性与交流”“人类动机的历史”。在他们眼中，《国富论》是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因为它关于经济进步原因的解释甚至比经济进步的本质更重要。由于历史的解释是理解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方式，因此，在他们看来，这部著作也是有史以来关于经济生活的最伟大著作。此外，《国富论》还被他们视为一部关乎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以及16至18世纪人类精神的史书。不过，他们还强调，斯密认为，尽管人性中存在着普遍的原则，但是政治生活和商业生活的原则是非常不同的，它们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斯密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永恒、普遍的“自利”教条，也没有永恒、普遍的“理性经济人”教条（Rothschild and Sen, 2006: 319—365）。希尔和蒙塔格试图将斯密关于知识、情感、社会、政府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切文本视为完整的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去解读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同时也强调，斯密著作本身的

“空白与缺失所产生的重力，迫使它表现为开放的状态”（Hill and Montag, 2015: 22—23）。施利塞尔则直接指出，斯密是一位系统的哲学家，涉猎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因此，他试图通过斯密在知识本质、情感理论、心智理论、语言阐释、因果关系的本质和方法论等方面的观点，来探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勾勒出斯密思想体系的各个要素及其内在联系。此外，他还将斯密放在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背景下，尤其是放在休谟、卢梭和牛顿的背景下来考察，以立体地展现斯密思想的来源、本质和影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还强调斯密非常关注公共政策建议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政策建议对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影响（Schliesser, 2017: 21—22）。玛丽亚·皮娅·帕加内利（Maria Pia Paganelli）力图揭示斯密的虚荣心观念与他的纸币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认为斯密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描述操纵纸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其目的是想暗示：只有人类的虚荣心，才能使人类拥有以商业为基础的运转正常、繁荣富裕和富有道德的社会（Paganelli, 2006: 271—286）。蒙特斯深入分析了斯密的经济均衡理论中所隐含的牛顿主义哲学观念。他认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牛顿式均衡论更倾向于一种非均衡，而法国的思想家用于理解现实社会的几何方式又为经济均衡理论铺平了道路；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员，对牛顿主义的理解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深刻得多（Montes, 2006b: 247—267）。詹姆斯·奥特森（James R. Otteson）不仅在《国富论》中探寻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还试图在《道德情操论》中挖掘他的政治经济学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涉及三个：一是有助于增加物质财富的幸福悖论，二是正义与仁慈所蕴含的不同政治寓意，三是迷恋于“政府的完美计划”的政治家（即“体系人”）所具有的危害性（Otteson, 2011: 73—85）。加文·肯尼迪（Gavin Kennedy）的学术抱负更大，他力图从斯密的重要著作中，梳理出贯穿斯密全部研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认为斯密主要运用了历史学家式的“向后看”的方法，即从久远的过去推向“现在”的方法，而非经济学家式的完善的假设与模型，来构建和呈现他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理论（Kennedy, 2007: 7—8）。

与上述宏观、整体的视域相对，在狭义的经济学范畴内多角度、微观地考察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时期英语学界斯密研究的第二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比较斯密与后世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个或某些论题所持的观点，并揭示斯密对后者的影响。例如，阿吉特·

辛哈 (Ajit Sinha) 探讨了斯密、马克思、皮耶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 等经济学家有关价值理论的异同 (Sinha, 2010)。罗伯特·斯蒂尼格 (Robert Steinegger) 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阐释经济学中的分工概念, 并讨论斯密、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杨小凯等人对这一主题的贡献 (Steinegger, 2010)。斯宾塞·帕克 (Spencer J. Pack) 比较了亚里士多德、斯密和马克思对交换价值、货币、资本、政府和变革等几个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 (Pack, 2010)。罗伯特·米切尔 (Robert E. Mitchell) 梳理了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马歇尔、凯恩斯、马克思、凡勃仑、熊彼特有关市场和经济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驱动力的不同看法 (Mitchell, 2014)。米歇尔·祖布拉基斯 (Michel S. Zouboulakis) 将斯密、穆勒、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经济理性进行了归纳和区分 (Zouboulakis, 2014)。维奈·巴拉特-拉姆 (Vinay Bharat-Ram) 从斯密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直写到森的福利经济学 (Bharat-Ram, 2017)。

其二, 对斯密文本中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研究, 以及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解读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例如, Aspromourgos (2009: 2—8) 旨在通过分析斯密文本中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 例如, 竞争、价格、分配、分工、财富、生产、资本积累等, 勾画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框架, 重建他的这一学说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所具有的特点, 探讨它与现代经济学、当代自由社会的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关联, 以及反思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命运, 并提出现代人可以从其中获得的诸多启示。罗思柴尔德和森将斯密的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学联系起来, 认为斯密揭示了贫穷与不自由、不平等之间存在概念上的联系。他们发现, 斯密认识到了贫穷是以某些基本的“不自由”这一形式存在的, 因为一个人假如没有与当时的社会标准相应的基本体面的衣着, 往往缺乏在公共场合毫无羞耻地露面的能力, 换言之, 他会感到非常难为情或不自在。例如, 在英格兰, 即使是最贫穷的人, “不穿皮鞋也会为出现在公共场合而感到羞耻”, 这既是一种由贫穷带来的“不自由”, 亦是一种以不自由为形式的贫穷。他们还指出, 斯密发现了经济不平等是贫穷的决定性因素, 其形式是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这一能力和权利, 斯密更多地是指向参与

社会生活、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和权利。斯密的这一开拓性分析，在他们看来，可以为基于能力的贫穷和剥夺研究提供充分借鉴（Rothschild and Sen, 2006: 359—360）。他们二人的上述言论也折射出，贯穿在森（1981）的《贫穷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的发展观——该发展观以关注人们的实质自由为核心——深受斯密贫穷论的启发。与之不同的是，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2007年首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以20世纪下半叶东亚的经济复兴为着眼点，探讨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重构斯密的经济思想。他认为，斯密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鼓吹者，也不是其理论家，他的市场理论对于理解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有用。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阿里吉集中论述了两个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过程，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的过程（阿里吉，2009：1—10）。

其三，研究斯密的货币和金融思想，以及他的这些思想对理解和化解当今全球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例如，泰勒·古德斯皮德（Tyler B. Goodspeed）将斯密的金融思想纳入18世纪和19世纪苏格兰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中予以考察。他认为，1845年之前，苏格兰的银行业高度分散、竞争激烈，政府既没有对银行规模给予正式限制，也没有特许某个银行垄断货币发行。这种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有效缓解了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由外源性政治冲击引发的两次严重国际收支危机给苏格兰带来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反，斯密倡导的银行监管，非但没有减轻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反而加剧了所谓的治愈方法带来的风险（Goodspeed, 2016: 7—8）。与古德斯皮德将目光聚焦于18、19世纪不同，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e）把视线转向当下和未来，指出现代金融危机既是一种经济危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和伦理危机。他提示读者，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相关思想，为理解和解决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政治和伦理困境，提供了经济治理的思路（Clarke, 2016: 142—146）。

这一时期斯密研究的第三大特征是，从新的视角挖掘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特征及其影响。就斯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来源而言，这一时期大致出现了四个研究维度。其一，探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神学基础，以及追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某些理论的古典之源。例如，杨永孙（Yong-Sun Yang）在《救赎经济学：亚当·斯密与黑格尔》中，挑战了经济学与神学彼此分离的固

有观念——它们通常被分别视为一门与事实打交道的科学和一门追求精神真理的科学，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斯密和黑格尔经济思想中蕴含的神学基础，丰富了读者对救赎相关问题的理解，为经济学家和神学家之间的未来对话提供了一个模式（Yang, 2012: 1—7）。格洛丽亚·维文奇奥（Gloria Vivenza）在《亚当·斯密与古典著作：亚当·斯密思想中的古典遗产》一书中，阐述了斯密的思想与古代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探讨了柏拉图对斯密的分工论、亚里士多德对斯密的价值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旨在说明古典时期的思想在塑造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Vivenza, 2001: 126—158）。其二，从休谟与斯密的关系入手，发掘休谟对斯密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是丹尼斯·拉斯穆森（Dennis C. Rasmussen）。他在《异教徒与教授：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中，按照休谟和斯密之间长达25年之久的友情轨迹展开——从1749年二人的初遇一直写到1776年休谟的离世。他试图通过描述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共同志趣，揭示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展现了斯密的经济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休谟，以及在哪些方面具有独创性（Rasmussen, 2017: 160—185）。其三，在研究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为斯密的一个对话者和论战者，探寻斯密思想中的卢梭痕迹以及斯密对卢梭思想的超越。例如，拉斯穆森指出，卢梭对商业社会提出了三大批判：第一，分工使得不平等加剧和劳动者虚弱无知；第二，商业和财富膨胀了人的虚荣心，使人们终日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中，由此引起了虚伪、欺骗等恶行；第三，人们对财富的无尽欲求，使自己陷入永无止境的辛劳中，最后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焦虑与疲惫。这三大批判深化了斯密对商业社会的理解，但是，斯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对卢梭的上述批判一一进行了有力的反驳（Rasmussen, 2008: 5—14）。此外，论文集《亚当·斯密与卢梭：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作者们指出，斯密和卢梭都对道德和政治哲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塑造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概念（Paganelli, Rasmussen, and Smith, 2018: 1）。其四，探讨法国重农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对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例如，尼古拉斯·菲利普松（Nicholas Philipson）探讨了斯密对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认为斯密不是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推出自己的体系：一方面，斯密使用了魁奈和重农学

派都能够理解的一种语言，并且开始考虑魁奈的观点——财富应被作为一个在自由市场不同经济部门间进行流通的功能性结果而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斯密认为，魁奈处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具有明显的揣测性和非历史研究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法国的经验和对于法国君主制未来的关注而加以调整，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有关经济发展一般理论的基础。菲利普松认为，斯密最终将魁奈视为对人性科学具有一种启发性和推动性但同时又提供了某些错误理论的体系的贡献者（Philipson, 2010: 193—219）。

就斯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特征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维度主要有三个。其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例如，简·开普勒（Jan H. Keppler）揭示出，斯密著作的丰富性源于一个矛盾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对经济私利和财富积累的追求服务于人们的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那就是获得社会认可、满足“同情”激情。他探讨了斯密式的个人是如何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被渴望获得社会认可的激情所激励，来将他的非社会激情转化为对社会进步和经济财富的渴望。换言之，他认为，在斯密看来，对财富的追求完全是由它在他人眼中所代表的价值驱动，而非由个人使用中的任何价值驱动（Keppler, 2010）。丰纳·福曼-巴齐莱（Fonna Forman-Barzilai）通过21世纪的世界主义视角，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融入到他的以同情为核心概念的道德哲学、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考察（Forman-Barzilai, 2010: 1—26）。这一视角不仅是对斯密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主义思想史和当代世界主义话语本身的重大贡献。其二，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解读其政治思想。例如，詹姆斯·哈里斯（James A. Harris）在《保护富人不受穷人的侵害：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学》中，指出并批评了斯密试图将教育作为缓解穷人对贫困的怨恨的手段（Harris, 2020）。与之相反，2015年洪特重申了三十多年前（1983年）的一个观点，即斯密是一位正义理论家，关注的是找到能够调和财产不平等的市场机制，并为被市场淘汰者提供充足的物质供应。他还进一步指出，斯密确信现代自然法的语言为严格的正义高于公民美德、消极自由高于积极自由这一论点提供了智力资源；但是，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对现代国际政治感到忧虑（Hont, 2015: 1—10）。其三，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全球化的思想。例如，罗思柴尔德和森认为，斯密将国际分工原则或最终被确定为“全球化”的远距离联系原则放在历史变迁中予以描述，因为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正

值18世纪中叶全球商业、投资、信息和影响力扩张的高涨期。他们发现，斯密对关乎“整个地球”繁荣的构想心存兴奋，“一个广袤的大陆内所分成的各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帝国内部所分成的各个省一样”。但是，斯密对庞大的全球体系又深表怀疑，因为在他的《国富论》中的核心人物是那些焦躁不安、四处游荡的股票所有者和批发商这样的“世界公民”，而非当地很有教养、内心宁静的土地所有者和小地产改良者。他们进一步指出，斯密所处的18世纪与我们所生活的今天有着共通之处，因此，斯密对地方与全球之关系的持续关注，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新时代将会更加引人注目，斯密的经济著作和他的经济进步史在未来依然不会过时（Rothschild and Sen, 2006: 364—365）。Noharo（2018: 1—15）也在斯密的著作中看到了他对全球化的理解。他认为，斯密的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商人在18世纪全球经济中的变革作用为前提的；斯密发现商人扩大了市场，从而扩大了国际分工，并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有利影响；斯密呼吁人们注意自由贸易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包括征服、入侵、殖民、奴役和战争。因此，斯密虽然没有生活在完全全球化的时代，但可以称得上有着全球化先见之明的学者。

就斯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那就是研究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埃莉诺·库特芒希（Eleanor Courtemanche）在《“看不见的手”和1818—1860年的英国小说：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与现实主义流派》中指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暗示了一个完整的时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特定行为的道德只能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被理解。作者还认为，斯密的讽刺道德模式影响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威廉·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小说家。具体言之，库特芒希认为，斯密与现实主义文学家分享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愿景，这个愿景围绕着一一种脆弱的信念建构而成，那就是相信意外后果带来的好处。不过，库特芒希认为，《共产党宣言》撕开了“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的复杂和间接的面纱（Courtemanche, 2011: 194—197）。

这一时期斯密研究的第四个特征是，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揭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核。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罗思柴尔德。她在《经济情操论：亚当·斯

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中，运用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将斯密、孔多塞以及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置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争论”这一背景中考察，揭示这些思想家们所代表的早期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的特质及其影响，加深读者对这一时代重大事件的了解，帮助他们分析当今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理解斯密时代以来的许多争议议题。故此，她在开篇即言：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故事，一个“自由放任主义尚在出生年代的故事”（Rothschild, 2000: 1—6）。此外，依循历史语境主义这一范式对斯密政治经济思想进行深入解读的代表人物还有杰西·诺曼（Jesse Norman）。他在2018年出版了《亚当·斯密：他思考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在该书的引言中，诺曼很有深意地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并非一位专业研究斯密的学者，而是一名具有哲学学术背景的在职政治家，一个与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频繁打交道的社会实践者。他以此强调自己力图从理论和实践这一双重视角去理解斯密。该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试图结合斯密所生活的18世纪的苏格兰和整个英国，打破人们建构的一个被称为“亚当·斯密”的夸张形象或者一些彼此完全对立的“斯密”形象（Norman, 2018: 1—10）。他还力图建立起斯密整个思想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包括斯密对哈耶克、凯恩斯和马克思等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家的影响；重申斯密体系中被忽略的内容，使其呈现出一个更全面的图景——不仅介绍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还介绍他更为广泛的知识体系。最后，该书专辟一个部分“影响”，将斯密直接“带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通过分析21世纪之初世界面临的各种困境，例如2004年美国企业盛行政治游说、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薪酬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裙带资本主义现象日趋普遍、合理的自由市场政策依然未成为常态、构建我们生活的隐性道德和社会规范亟待确立等等，诺曼将斯密丰富、深刻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其最终的目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强调的，我们不仅要认识斯密的思想，还要知道他的思想为什么重要，并为下一代找到应用其思想的新的可能。

总之，21世纪以来的斯密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既有宏观、综合的考察，又有微观、局部的分析，研究的“触须”不断向外延伸和朝纵深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立体多面，甚至相互对立的图景。这些成果体现了斯密研究者的意图：站在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采用更丰富的文献挖掘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源泉、特征及其影响，并且得出了许多新颖、多元甚至迥异

的结论，由此在20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斯密思想体系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使人们重新认识了21世纪初期的人类及其所生活的世界。

四、借鉴与开拓：对未来斯密研究的一些思考

综上所述，近70年来，英语世界的斯密研究，历经了打破藩篱、走向繁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三个阶段，斯密的思想遗产被不同领域的学者所关注和阐释。这一持续已久、至今未艾的趋势，说明了斯密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持久魅力，及其对人类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这也揭示了，只要人类社会还在继续迈进，只要研究者所处的时空不同、拥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偏好不同，尤其是研究范式的不断推陈出新，斯密研究就不会终结，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一天，研究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一点放在史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在历史学中正像在一切严肃的问题上一样，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终的。”（柯林伍德，1986：244）

斯密是18世纪典型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体系非常庞大，思想极其丰富，影响极度深远，本文仅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及其研究范式演进的角度，对未来斯密研究做一些思考。

上个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反对单纯追踪思想体系的演变，强调“观念的单元”（unit-idea），即他所言的西方思想传统中一些恒久不变的基本观念（洛夫乔伊，2015）。之后，学界在批判洛夫乔伊的这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使观念史呈现出如下一系列新的研究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德国的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研究范式，认为通过聚焦一些核心“概念”，研究者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特定的历史进程，也可以理解一个社会如何按照这些概念的含义建构起自身（汉普歇尔-蒙克，2010）。20世纪80年代，以波科克、斯金纳等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历史语境主义”（history contextualism）研究范式，将观念史研究的重点加以转换，由关注经典文本开始转向语境，由关注观念的表达转向研究思想家的言说方式，即修辞（斯金纳，2002）。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林恩·亨特（Lynn Hunt）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开创了“观念社

会史”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又称“新文化史” ——研究范式, 主张把观念放入社会语境中, 研究观念“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 考察观念在组织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强调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李宏图, 2018)。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兴起, 近十年来, 思想史领域出现了思想史的“国际转向” (international turn)。^① 学者们开始探讨概念在不同空间的流动, 以此重新认识和组织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 (Armitage, 2014: 232—252)。上述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演进与多元化, 均为开拓斯密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视野。

第一, 斯密的思想既是对过去思想的继承和重构, 同时也被后世思想家们重构与继承。因此, 在解读斯密的经典文本时, 一方面可以聚焦其中能体现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些基本“概念”, 例如, “看不见的手” “激情” “自利” “同感” “分工” “自由” “正义” “财富” “富裕” “奢侈” “贫穷” 等等, 考察斯密作为经典作家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形成和重构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 也注意斯密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在时空中的“迁移、接受、转移和扩散”, 以揭示这些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 这些概念在后来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被什么概念所取代, 以及这一取代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第二, 斯密是一位身处苏格兰社会转型时期、目睹苏格兰社会急剧变迁的思想家, 深受转型时期各种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的吸引和触动。同时, 他又是一位有着广泛的社交网络、积极介入公共活动的知识分子, 除了与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交往密切、相互影响外, 他还与 18 世纪英国的许多政治精英、商界巨头和其他社会名流进行过思想交流, 积极推动了那个时代社会观念的重构, 以及社会的转型和进步。因此, 深入研究斯密所处的时代——18 世纪苏格兰的社会变迁 (例如,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农业改良、海外贸易扩张、金融业的兴起与发展, 以及工业革命的开启), 深入剖析斯密与他同时代的苏格兰人之间的交流和争论 [例如, 哈奇森、休谟、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亨利·邓达斯 (Henry Dundas)、约翰·辛克莱爵士 (Sir John Sinclair), 以及两

①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于 1963 年出版了《西方的兴起: 人类共同体史》(麦克尼尔, 2017) 一书, 由此被誉为“20 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该书不仅标志着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兴起, 还为近年来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奠定了基础。

位遭到斯密批判并被后世学者忽视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劳和斯图尔特],有助于挖掘斯密思想的基本特征、理论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第三,斯密所生活的18世纪,是一个欧洲人与外部世界的“他者”频繁相遇的时代。这样一种跨文化相遇,使世界各地的各种知识交汇在一起,为斯密这样的启蒙文人观察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探究这种“多样性”背后的普遍规律,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条件(周保巍,2020)。同时18世纪还是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的时代,斯密的著作一经问世,不仅在国内备受欢迎,还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思想界,对同时代以及后世欧洲其他各国的影响也很深远(Hill and Montag, 2015: 6)。^①此外,这个时期也是工业文明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代,斯密的著作也被许多非西方国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译介和传播,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②因此从全球史视角,将斯密的思想置于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这一广阔的互动情景中去研究,有助于把握斯密的学说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揭示出经典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下所经历的命运。

可以预见,随着上述日趋多元的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广泛应用,曾经被忽视的众多文献将会走进学界的视野,不断得到发掘、整理和解读。在此基础上,斯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亦将再次得到重大推进,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将进一步得以展现,人类对于自身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路径选择的认识亦将会更加深入。

① 在19世纪最后20余年里,《国富论》在欧美的影响非常广泛,有美国版、德国版、丹麦版、法国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以及盖尔语版(Hill and Montag, 2015: 6)。

② 日本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注意到了斯密的重要性,号召国民去阅读他的著作。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亚当·斯密学会”,该学会出版了多册《亚当·斯密研究》。东京大学设有“亚当·斯密文库”,里面珍藏着308册斯密的藏书。1990年,日本在名古屋举办纪念斯密去世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足见斯密的思想在近现代日本的影响之大(朱绍文,2001: 67—74、97—100)。另一个例子是近代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起,斯密开始为国人所知。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他的一本汉文译著中就提到了斯密。19世纪70年代驻英公使郭嵩焘及其副使刘锡鸿留意到了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性;19世纪80年代,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出版的某些著作中提到了斯密的一些经济思想。这些关注与介绍要远早于严复翻译《原富》(即《国富论》)的1902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在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和160周年之际,均举行了纪念性活动(张登德,2020a, 2020b)。

参考文献:

- 阿里吉, 乔万尼, 2009,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 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波兰尼, 卡尔, 2007,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刚、刘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凡勃仑, 2002, 《有闲阶级论》, 蔡受百译, 商务印书馆。
- 哈耶克, F. A. 冯, 1989,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贾湛、文跃然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冯, 2000, 《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 冯克利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汉普歇尔-蒙克, 伊安, 2010,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周保巍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霍奇逊, 杰夫里·M., 2007, 《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 任荣华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康子兴, 2017, 《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 柯林伍德, R. G., 1986, 《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雷, 约翰, 1983, 《亚当·斯密传》, 胡企林、陈应年译, 商务印书馆。
- 李宏图, 2018, 《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 《史学集刊》第 1 期。
- 卢森贝, 1959, 《政治经济学史》第 1 卷, 李侠公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罗卫东, 2006, 《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洛夫乔伊, 阿瑟·O., 2015, 《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张传友、高秉江译, 商务印书馆。
- 麦克尼尔, 威廉, 2017, 《西方的兴起: 人类共同体史》, 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 中信出版社。
- 米瑟斯, 路德维希·冯, 1995,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韩光明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纳尔逊, 理查德·R., 悉尼·G. 温特, 1997,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胡士凯译, 商务印书馆。
- 诺曼, 杰西, 2021, 《亚当·斯密传: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李辉译, 中信出版集团。
- 斯金纳, 昆廷, 2002,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下), 奚瑞森、亚方译, 商务印书馆。
- 斯皮格尔, 亨利·威廉, 1999, 《经济思想的成长》, 晏智杰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熊彼特, 约瑟夫, 1996, 《经济分析史》第 1 卷, 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
- 张登德, 2020a, 《亚当·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考察与分析》,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张登德, 2020b, 《近代中国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与评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科学版)》第2期。

周保巍, 2020, 《“全球史”和“思想史”如何相遇?》, 《史学理论研究》第5期。

朱绍文, 1990, 《亚当·史密斯与当代——出席名古屋纪念亚当·史密斯逝世200周年国际讨论会侧记》, 《经济学动态》第10期。

朱绍文, 2001, 《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Armitage, David. 2014.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pp. 232 – 252.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promourgos, Tony. 2009. *The Science of Wealth: Adam Smith and the Fram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Berry, Christopher J. 1997. *Soci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harat-Ram, Vinay. 2017.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Adam Smith to Amartya Sen and Bey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e, Chris. 2016. *Ethics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Using Adam Smith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mim, Flavio. 2006. “Adam Smith: Common Sense and Aesthetics in the Age of Experiments.” In *A History of Scottish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Alexander Dow, and Sheila Dow, pp. 123 – 145.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ourtemanche, Eleanor. 2011. *The “Invisible Hand” and British Fiction 1818 – 1860: Adam Smith,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Genre of Realism*. Basingstok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ropsey, Joseph. 1957. *Polity and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Adam Smith*.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Hagu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Davis, John B. 1989. “Smith’s Invisible Hand and Hegel’s Cunning of Rea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6 (6): 50 – 66.

Dow, Alexander, and Sheila Dow. 2006. “Introduction.” In *A History of Scottish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Alexander Dow, and Sheila Dow, pp. 1 – 8.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Fitzgibbons, A. 1995. *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 Wealth and Virtue: The Moral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leischacker, Samuel. 1999. *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 Judgment and Freedom in Kant and Adam Smi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bes, Duncan. 1975. *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man-Barzilai, Fonna. 2010. *Adam Smith and the Circles of Sympathy: Cosmopolitanism and Mor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he, Fred R. (ed.). 1978. *Adam Smi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 1976: Bicentennial Essays*. Boulder;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 Goodspeed, Tyler Beck. 2016. *Legislating Instability: Adam Smith, Free Banking,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77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akonssen, Knud. 1981.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The Nature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GB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akonssen, Knud. 1996. *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 From Grotius to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J. A. 2020.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ch against the Poor: The Politics of Adam Smith’s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7 (1): 138 – 158.
- Hill, Mike, and Warren Montag. 2015. *The Other Adam Smit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dgson, Geoffrey M. 1999.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Cheltenham/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 Hont, Istvan. 2015.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nt, Istvan, and Michael Ignatieff. 1983.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e, V. M. 1989. *Virtue by Consensus: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Hutcheson, Hume, and Adam Smith*. New York/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utton, Alan. 2006. “A Scottish Tradi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 History of Scottish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Alexander Dow, and Sheila Dow, pp. 228 – 244.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Kennedy, Gavin. 2007. *Adam Smith: A Moral Philosopher and His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Keppler, Jan Horst. 2010. *Adam Smith and the Economy of the Passion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Macfie, A. L. 1967.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Papers on Adam Smit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Mitchell, Robert Edward. 2014. *A Concise History of Economist’s Assumptions about Markets: From Adam Smith to Joseph Schumpeter*. Santa Barbara: Praeger.
- Montes, Leonidas. 2006a. “Adam Smith; Real Newtonian.” In *A History of Scottish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Alexander Dow, and Sheila Dow, pp. 102 – 119.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Montes, Leonidas. 2006b. “On Adam Smith’s Newtonianism and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 Theory.” In *New Voice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Leonidas Montes, and Eric Schliesser, pp. 247 – 267.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Montes, Leonidas, and Eric Schliesser. 2006. “Introduction.” In *New Voice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Leonidas Montes, and Eric Schliesser, pp. 1 – 5.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Morrow, Glenn R. 193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rine of Sympathy in Hume and Adam Smith.”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32 (1): 60 – 78.
- Noharo, Shinji. 2018. *Commerce and Strangers in Adam Smith*.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Pte. Limited; Berlin: Springer.
- Norman, Jesse. 2018.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 London: Allen Lane.
- Nozick, Robert. 1994. “Invisible-Hand Explan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 314 – 318.
- O’Driscoll, Gerald P. (ed.). 1979. *Adam Smith and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Bicentennial Essays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Otteson, James R. 2000. “The Recurring ‘Adam Smith Problem’.”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17 (1): 51 – 52.
- Otteson, James R. 2011. *Adam Smith*.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Pack, Spencer J. 2010. *Aristotle,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On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in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Northampton,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 Paganelli, Maria Pia. 2006. “Vanity and the Daedalian Wings of Paper Money in Adam Smith.” In *New Voice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Leonidas Montes, and Eric Schliesser, pp. 271 – 286.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Paganelli, Maria Pia, Dennis C. Rasmussen, and Craig Smith. 2018. *Adam Smith and Rousseau: Ethics, Political, Econom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son, Nicholas. 2010.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ocock, John G. A. 1983.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cock, John G. A. 1985.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smussen, Dennis C. 2008.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 to Rousseau*.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asmussen, Dennis C. 2017.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the Friendship that Shaped Modern Thought*.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ndall, Jane. 1978. *The Origins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ss, Ian Simpson. 1995. *The Life of Adam Smith*.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schild, Emma. 2000.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schild, Emma, and Amartya Sen. 2006. "Adam Smith's Econom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 pp. 319–365.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liesser, Eric. 2017. *Adam Smith: Systematic Philosopher and Public Think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New York/Evanst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Scott, W. R. 1937. *Adam Smith as Student and Professor*. Glasgow: Jackson, Son and Company.
- Sen, Amarty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ha, Ajit. 2010. *The Theories of Value from Adam Smith to Piero Sraffa*. New Delhi: Routledge.
- Skinner, Andrew S. 1975. "Introduction." In *Essay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Andrew S. Skinner, and Thomas Wilson, pp. 1–1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kinner, Andrew S. 1979.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inberger, Robert. 2010.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From Adam Smith to Xiaokai Yang and Inframarginal Analysis*.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 Stewart, Dugald. 1980.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Adam Smith." In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pp. 265–33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B. 1914.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 Vivenza, Gloria. 2001. *Adam Smith and the Classics: The Classical Heritage in Adam Smith's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nch, Donald.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Yong-Sun. 2012. *Economics of Salvation: Adam Smith and Hegel*. Bern: Peter Lang.
- Zouboulakis, Michel S. 2014. *The Varietie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From Adam Smith to Contemporary Behaviour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tudies on Adam Smith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for Seventy Years

Yang Fa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Before the 1950s, due to the limited data, the studies on Smith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ere confined to a relatively single field. With the discovery and public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relatively unidirectional interpretation began to turn to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stagflation of the 1970s, especially coupled with the successive publication of the *Glasgow Edition of Adam Smith's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1976 and 1983, led to a boom in the studies on Smith.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s have seen a spurt of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twenty years.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with the onset of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field of the research on Smith,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gain. Scholars have re-interpreted Smith's theor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mith stud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o as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dynamics of Smith studies abroad and explore the future expansion of this field with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y of ideas.

Keywords: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tudies on Adam Smith, History of Ideas

JEL Classification: B12, B14, B16

(责任编辑: 秦 蒙)